

第三卷

唐凯麟 主编

中华民族

邓名瑛 著

ZHONG HUA MIN ZU
AI GUO ZHU YI
FA ZHAN SHI

爱国主义发展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第三卷

唐凯麟 主 编
张怀承 副主编

邓名瑛 著

ZHONG HUA MIN ZU
AI GUO ZHU YI
FA ZHAN SHI

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发展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第3卷/邓名瑛著;唐凯麟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ISBN 7-5351-2880-7

I.中… II.①邓… ②唐… III.爱国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IV.D64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940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430074·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6 插页 19.625 印张

版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430 千字

印 数:1-3 000

ISBN 7-5351-2880-7/G·2347 全 套 书 (共 四 卷) 定 价:11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唐凯麟 1938年9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62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任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委员等。自1983年以来，先后出版专著3本，编著教材1本，主编教材3本，主编丛书2套，合著13本，发表论文160多篇。先后获全国性科研优秀成果奖5项，省部级一、二等奖12项，是全国优秀教师、湖南省十名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之一，1992年应聘为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金评委，1998年应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金评委。



邓名瑛 1962年11月生，湖南桂阳人。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出版了《寻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学的本体追求》、《文化建设论》等；发表的论文有《关于哲学启蒙的思考》、《论中国文化的世俗化问题》、《集体主义再认识》等70余篇。



绪论

本卷讲的近代是指从 1840 年到 1949 年这段历史时期。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在时间跨度上达上百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历经清王朝、民国政府、军阀混战以及以蒋家王朝为核心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个阶段。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状况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是，贯穿这百年多的历史主线却始终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致力于民族富强与民族振兴。正是在这百年多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因其置身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而经受了时代的洗礼，被赋予了这个时代的特定内容，从而实现了从古代爱国主义到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性转换与升华。这是一首交织着血与泪、刀与火、旋律悲壮激越的碑国主义交响曲，在它的感召和呼唤中，古老的中华民族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困厄，迎来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新

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

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受制于该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以及影响这一主要矛盾之解决的诸多次要矛盾。中华民族近代爱国主义的任务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都与中国近代社会所要解决的矛盾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把 1840 年至 1949 年这段历史看做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的近代阶段，正是源于这一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所具有的特殊内容，即它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那么，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特殊矛盾是什么呢？

从历史看，尽管从明中叶起，中国社会即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然而，这些业已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清代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相反，其发展速度及其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仍处在封建社会阶段。首先，从经济上看，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主导地位，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只占有少量或者没有土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其次，从政治上看，清王朝实行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满族贵族和少数汉族地主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再次，在思想文化上，清王朝同样实行专制主义。一方面，为压制一部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大兴“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活动中不得不谨小慎微，惟恐一字不慎而招致杀身甚至满门抄斩的大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

为稻粱谋”，是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则又承续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力求以此来笼络、驯服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以上双重政策导致了思想文化上万马齐喑的局面。总之，以上状况表明，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清代社会亦不例外。此外，从属于这一主要矛盾的是：清统治者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已经萌芽并要求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具有改良倾向的文化思想和陈腐保守的文化思想之间的矛盾，等等。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说到底是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无节制地追求高额利润的必然结果，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力图将中国纳入其资本机体运行的过程，亦即是一个强制输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输出，必然猛烈地冲击着古老天朝帝国的社会基础，这一情形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鸦片战争后，小农经济加速瓦解就是极好的证明。与此相应，它也必然要求政治、文化因素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把中国强制纳入其资本机体运行的过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产地，以获取高额利润，这就必然引起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强烈反抗，从而，这一过程也就必然地带着极端的残酷性和野蛮性，而业已成长壮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军事实力则为这种残酷性和野蛮性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鸦片战争及其

以后的百年历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一直奉行炮舰政策，为这种残酷性和野蛮性作了最好的注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中，中国主权丧失，国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民族被蹂躏，整个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统治者到被统治者都不可能在原来的轨道上生活下去了。

随着中国社会状况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满清贵族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有时还很尖锐，但毕竟已下降为社会的次要矛盾。这是因为，尽管在国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但他们毕竟生活于共同的文化环境中，拥有共同的国家主权，因而，当面临着帝国主义入侵时，遭受损害的是整个民族的利益，这就必然使矛盾的各方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暂时妥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也就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由这一主要矛盾所决定，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在民族内部还表现为爱国、救国者与误国、卖国者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在近代中国，爱国、救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然而在民族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还存在着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形，使爱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必然要求某些阶级、阶层、个人的特殊利益作出相应的牺牲，尤其是当广大下层民众全面加入爱国主义运动行列时，对统治者利益的冲击就更为明显。这就使得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既不能容忍帝国主义的入侵，又害怕民众的爱国主义要求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危及他们的统治，因而，在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面前，要么急

功近利，要么顽固保守，成为事实上的误国者，例如清王朝中的顽固派官僚即是这样的误国者。同时，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保护其在华的利益，也在寻求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于是一些民族的败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全民族的利益，卖身投靠帝国主义，这些人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是卖国者，因而也是全民族共同的敌人。综观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爱国主义者和误国者、卖国者之间的矛盾，同样是贯穿始终的。再次，在中国近代史上，由反侵略的任务所决定，中国社会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愈益急迫和强烈，由此也必然产生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封建势力以及其他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直接表现为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此外，在中国近代史上，随着无产阶级的逐步成长壮大，无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在日益发展着，这一矛盾的发展同样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是复杂的，这些矛盾规定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及其具体内容。

二、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强。

毫无疑问，近代爱国主义的锋芒所向，是直接指向外来侵略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化，存在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就必须奋起反对外来侵略，拯

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但是，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得以实现的。和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比较起来，中国封建制度下弱小的经济和落后的军事力量无法与其抗衡，因此，要拯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使整个民族从物质到精神都强盛起来，才能最终战胜外来侵略势力，这样，图强又成为救亡的一个重要前提。反过来，要图强又必须赶走外来侵略势力，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走自由独立的民族发展之路，因此，救亡任务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图强事业的成败。救亡与图强就是这样互为前提、互为目标地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主题的一体两面。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所包含的救亡与图强的统一性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全面到全面、由肤浅到逐步深入的过程。在鸦片战争时期，作为主权国家之代表的清王朝，在反对外来侵略中，其立足点仅在于保持天朝帝国的权威，捍卫主权；而民间的反抗也同样着眼于维护主权的。这说明，这种反抗仅仅立足于救亡的一面，并没有把反侵略与追求民族繁荣富强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某些先进分子已产生了朦胧的要求把救亡与图强结合起来的思想，但毕竟还未能成为某一阶级或某一阶层的共识，更不用说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了。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的阶级矛盾也随之日趋尖锐，加之清政府在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锋以及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军事工业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统治者逐步认识到要拯救民

族危亡，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又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军事工业为基础。这样，救亡首先与军事领域的求强联系起来，其标志便是洋务军事企业的兴办。图强一经开风气之先，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图强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它与物质的富裕、政治的开明和文化的启蒙密切相联。于是，人们在“兵战”之外又提出了“商战”、“学战”，政治改良与革命、文化思想启蒙等一系列与图强相关的主张，其目的都指向救亡，这反映了人们对救亡与图强两者关系认识的深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先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此相应，人们提出了许多诸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救国理论，它们都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具体表现。

救亡与图强的这种一体两面性，决定了近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运动必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一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逐步积蓄着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所需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这也昭示着中华民族近代爱国主义任务的艰巨性。

从实践来看，救亡与图强这一近代爱国主义主题的一体两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平衡的。相反，在某些时期，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救亡的一面比较突出；而在另一些时期，在历史发展的另一些阶段上，则图强的一面又被凸显出来。当然，救亡与图强地位的动态演化，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两者互为表里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贯穿了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全过程。

正是在救亡与图强这一近代爱国主义主题的召唤下，

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披荆斩棘，上演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爱国主义活剧，谱写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史诗。

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 历程及其特点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综观这一百多年的爱国主义发展历程，可以将其相应地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及其分化，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

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华民族第一次面对近代意义上的外来民族国家的武装入侵，这亘古未有的大事变，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民族的生存第一次真正面临着危机。中华民族不得不走上近代反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机的艰苦历程。从这一阶段爱国主义发展的内容及目标指向看，其近代性并不明显，传统的封建性和并不浓厚的近代性交错在一起，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这主要是因为，面对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处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无论是清政府中爱国官兵的正规抵抗，还是民间自发的还击，都是围绕着维护作为主权国家之代表的清王朝而展开的，这是以落后的封建制度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抗衡。往后，洋务派官僚注意到发展资本主义军事和民用工业的重要性，但其着眼点仍是企图以此抵抗外

来侵略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尽管这一运动客观上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太平天国革命是将推翻清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的，但其理想却是要建立乌托邦式的农民政权。因而，尽管其纲领对农民颇有吸引力，相对地说，其理论准备更为充分，组织更为严密，规模也更为庞大，但其总体性质并未表现出与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的质的区别。虽然它的后期有洪仁环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但此时革命已是强弩之末，缺乏其实践的现实践条件。总之，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其近代性转化。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一部分人逐步认识到在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矛盾和困难，从而提出了部分改良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要求，导致了洋务派的分化，一部分人成为早期的改良派。早期改良派的兴起，意味着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力图走出传统的自觉，标志着近代爱国主义即将走进第二阶段。

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的特点，是资产阶级走上了爱国主义运动的前台。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要求变革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其目标指向不再是维护封建的清王朝，而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民族富强，拯救民族危机。

如前所述，在洋务运动后期，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已经有见于在封建制度的外壳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从而提出了某些改革封建制度的要求。然而，早期改良派本身是矛盾的，他们既要求对封建制度作出某

些改良，但同时又死死抱住封建的伦理纲常不放。加之他们大多为买办资产阶级出身，因此，他们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覆沉大海，被誉为“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而《马关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样一种“难局”，加快了资产阶级把变革封建制度的设想付诸实践的进程，因而戊戌变法应时而生。在戊戌变法中，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以及它和下层民众的矛盾，使得它不敢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实现变革的要求，而是企图通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这一目的，因而，这一运动在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绞杀下很快便失败了。当然，它所要求的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并未随着这一运动的失败而消亡。往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努力实践其变革封建制度的理想的同时，中国广大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一直在自发地进行着反外来侵略的武装斗争，给帝国主义列强以沉重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瓜分中国的狂潮。然而，下层民众反外来侵略的斗争，因其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始终未能摆脱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盲目排外旧习的影响。和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也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他们反侵略的目的也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潮流相距甚远。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下层民众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并未能真正汇入时代的大潮。

当然，由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已经自觉地把救亡与变革封建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并付诸实践，中华民族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自觉的第一步，实现了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统一，并以此和第一阶段的爱国主义相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只是在第二阶段上才真正实现了其近代转换。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恶性膨胀，加紧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开始了其全面吞并中国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迅速上升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就这一阶段爱国主义的发展内容来看，以救亡图强为目标的近代化进程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深入到了思想文化领域，塑造新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反对封建传统成为这一时期近代化的主题。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8年抗战，赶走了外来侵略势力。和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广大下层民众的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被有效的组织起来，成为反对外来侵略的主力军，各阶级、各阶层实现了反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机的大联合。同时，在这一阶段反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作为反外来侵略的主力军，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成为崛起于中国近代舞台的新的政治力量，从而也决定了近代以来的救亡运动，不可能以实现资本主义为其归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运动又经历了一个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大官僚利益的国民党企图

实现独裁统治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工农民众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近代爱国主义的任务得以大体实现。

综观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尽管各阶段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作为一个整体，近代爱国主义仍有不同于古代爱国主义的一些总体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代爱国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它鲜明的近代性。

近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探索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前已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对传统封建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征服——尽管这种征服带有浓烈的血腥味，但它毕竟从客观上促进了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反省被欺凌的深刻根源，从而激发起中华民族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雄心壮志。救亡与图强的有机结合，引导中国社会迈开了走出中世纪、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步伐。从历史实践来看，鸦片战争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林则徐、魏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表明他们已经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并力图把这种优势变为自己的优势。这一思想客观上成了中国近代化的理论源头。往后，洋务派将林、魏的上述思想付诸实践，迈开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第一步。应该说，洋务官僚们的洋务实践，其主观目的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但社会历史变革的逻辑进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包含着物质、制度和精神等要素的有机体，因而，要吸收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成果，不进行相应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以洋务运动为契机，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逐步由物质层面的变革进入到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变革，中国社会的近代进程也表现为由浅入深的演进脉络。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风貌——而这一切都是和拯救民族危机、追求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近代文明的洗礼，走上了创造有别于传统社会文明的征途。这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丰硕成果，也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鲜明特色。

近代爱国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内容的丰富性。

由救亡与图强的时代主题所决定，近代爱国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爱国者的共同任务。但是，由于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因而，他们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并围绕这些救国主张来展开自己的救国实践。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先后出现过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以及制度革命以救国等诸多救国理论；在实践上，有人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求富，有人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引进、发明与推广，有人潜心于平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有人穷毕生精力向封建思想作不妥协的斗争以重塑民族魂，还有人亡命奔波从事于对旧制度的改良或革命，等等。尽管这些理论和实践有各自的特色，但其目标指向却是共同的，这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使命，因而，它们都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惟其如此，近代爱国主义才显得波澜壮阔。这种丰富性是